

“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 发展新路径探究

武文超

(上海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093)

摘要: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新使命。以“第二个结合”为理论视角, 系统探究新时代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新路径。“第二个结合”具有其历史必然性与重要的时代价值, 是实现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从哲学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三个维度剖析“第二个结合”何以具有内在可能性与逻辑必然性, 并聚焦于满足社会需求、完成话语体系转型、创新表现形式与传播路径三个层面对“第二个结合”的实践新路径进行系统阐释。研究“第二个结合”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新路径的问题, 将为筑牢文化主体性、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等方面提供根本性支撑, 并最终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范式。

关键词: “第二个结合”; 社会主义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26)01-0080-07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51216721

New Pathways for Socialist Cultural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econd Combination”

WU Wenchao

(School of Marxism,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ut forward the new mission of invigorating the innovative and creative national culture and promoting the flourishing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econd Combina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new pathways for advancing the flourishing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culture in the new era. The “Second Combination” embodies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and profound contemporary value, and represents an essential path toward building a culturally powerful nation. Across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philosophical ontology,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ossibility and inevitability of the “Second Combination”. Focusing on addressing social needs, transforming discourse systems, and innovating expression forms and communication channels, it provides a systematic explanation of the new practical pathways for implementing the “Second Combination”. By examining how the “Second Combination” fosters the flourishing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culture, this paper offers

收稿日期: 2025-12-16

基金项目: 上海理工大学教师发展研究项目(CFTD2024YB27)

第一作者: 武文超, 女, 讲师。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哲学。E-mail: wuwenchao@usst.edu.cn

foundational support for strengthening cultural subjectivity, advancing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enhancing national cultural soft power. Ultimately, it contributes Chinese wisdom and Chinese paradigms to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words: the “Second Combination”; socialist cultur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已迈出新的坚实步伐，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经济、科技层面的现代化，更是文化层面的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是重要保障。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我国文化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1]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十五五”时期如何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最终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这是我们在文化领域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第二个结合”开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科学道路

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活力，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首先要找到科学路径。社会主义文化的形成，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这个根基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2]^[4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大地上有着深厚的根基，每一个中国人在成长过程中都受到中国自身文化因素的深刻影响。中华民族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柱

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始终具有核心影响力。我们需要在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一步传承和弘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事业日益繁荣。”那么，什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呢？“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3]^[203]只有完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构建满足人民需求、紧跟时代步伐的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

究竟应当如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呢？“两个结合”为我们指明了科学的发展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两个结合”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27]。习近平总书记尤其强调“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性。“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2]^[30]。这种结合不是生硬的拼凑、拼盘，而是真正在理解掌握的基础上进行深层次的文化交融。通过文化融合构建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即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文化形态。

“第二个结合”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互相成就。这种“结合”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才能造就出一种全新的文化生命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以先进思想理论的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不断实

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显示出日益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2]33}随着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时代浪潮日新月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传承与创新过程中,亦遇到了诸多问题与挑战。如何在“第二个结合”的路径视域下完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及在“十五五”规划期间完成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重大文化使命?这是实现文化层面的现代化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二、“第二个结合”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历史逻辑

(一)文化主体性的挑战与困境

在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浪潮下,新时代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亦需面对诸多问题与挑战。当今经济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而社会也处于全方位转型阶段。人们在感受到智能科技带来的诸多便利的同时,在思想意识层面也受到了多重冲击。媒体发展形式日新月异,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态势。通过网络信息与媒体的宣传,对人们世界观、价值观的影响是复杂且多维的。一方面,多元化媒介的信息传播能够让人们多渠道了解中国国情及国际格局。同时在文化领域,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多元化更有利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有助于大众积极汲取和借鉴更多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另一方面,多元化媒体传播与发达的网络系统,亦对人们的生活及价值观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

其一,推送相似爱好的新闻或视频,会让人逐步陷入信息茧房。这种思想传播过程中形成的文化单一性,固化了思想的边界,不仅无助于科学世界观的形成,反而可能强化认知偏见。其二,时间碎片化与信息碎片化带来的消极影响。面对良莠不齐的信息轰炸,最容易导致的后果便是人们不予甄别地全盘吸收。而这本身就是对人的主观判断力的一种破坏,理性思维能力遭到严重削弱。其三,受到西方价值观渗透,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受到威胁。西方社会利用各种发达的传媒手段,通过新闻、娱乐节目、影视作品等渠道,大量输出其价值观、意识形态等内容,如个人主

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等。这种渗透潜移默化地诱导、误导大众的思想意识,导致人们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世界观、价值观渐行渐远。面对当下文化主体性与文化自信层面遇到的危机与挑战,我们应当如何破局?

(二)文化自信的复兴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历史和现实一再告诉我们,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只有根植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2]28}实现文化自信,是文化强国的重要保证。文化自信是人民对本国原有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认同。而自近代鸦片战争以来,殖民侵略者通过坚船利炮打开了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国门。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所带来的深重屈辱,以及中国积贫积弱之惨痛现实的沉重打击。仁人志士们至此开始不断反思,究竟怎样才能救中国?从魏源《海国图志》中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提出学习西方科技到主张“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从“戊戌变法”尝试君主立宪到辛亥革命建立“民主共和”。旧式的民主主义革命相继失败,使得中国人逐渐意识到,要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除了改变落后的经济政治现状,更要彻底改变人心,需要通过“启蒙”来完成人民在思想文化层面的根本转变。正如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指出的:“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4]7-8}一方面,随着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人们开始对封建礼教以及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进行激烈的批判。至此国人对于传统文化陷入了深深的自卑,有人甚至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而值此民族危亡之际,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迅速得到广泛传播,并成为我党革命实践的指导思想。历史用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正确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守的信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一种全新的文化即将破土而出,而文化自信将在新文化的形成过程中,焕发出新

生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在文化层面上的相互交融，故“第二个结合”是历史发展之必然趋势。对于当今中国文化主体性所面临的挑战与困境，“第二个结合”为我们指明了一条科学的道路。即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完成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真正增强文化自信，进一步巩固文化主体性。

三、“第二个结合”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客观依据

那么，通过“第二个结合”来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是否具有可能性与可行性呢？其实现的客观依据又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的前提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比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2]32} 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后，得到中国人民的认可与欢迎，扎根于中国大地并开花结果，这绝非偶然，而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有其融会贯通之处。只有坚持“第二个结合”，在融合的基础上才能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筑牢文化主体性。

（一）从本体论层面探析“结合”何以可能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的本质是客观物质，意识是物质的反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5] 32-33} 物质决定意识，物质为第一性。“在改变自己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6] 525} 马克思认为现实能够改变思维，生活决定意识。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自古便有的“气本论”的宇宙观，这便是古代

朴素唯物主义的原型。如庄子认为人本身就是物质的存在，即“气之聚”，宇宙也是由“气”构成的。“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古曰通天下一气耳。”（《庄子·知北游》）而这种“气本论”的宇宙观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不断延续发展。东汉王充提出了“元气自然论”，指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气之生人，犹水之为冰也。水凝则为冰，气凝为人”。（《论衡·论死篇》）北宋张载则提出万象皆为气，“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正蒙·乾称篇》）“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正蒙·太和篇》）太虚即为宇宙，宇宙的本体即为气。宇宙万物的形成或消亡都是“气”运动变化的结果。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中进一步发挥张载的思想，指出：“虚空者，气之量……凡虚空皆气也。”（《张子正蒙注》）正是以上中国哲学家们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宇宙观，为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土壤与客观环境，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现实。

以上是对宇宙本原的探寻，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也殊途同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人是自然界的一分子，自然与人是“大我”和“小我”的关系，“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最核心的宇宙观。道家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二十五章》）人与自然从不是主客体的对立的关系，而是统一的存在。庄子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此“天”并非神秘之天、超验之天，而是自然之天。而马克思也指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的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7]122} 马克思指出这是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想状态，人认识并遵循自然规律，将自身看作自然界的一部分。对此问题，金瑶梅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遵循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兼具鲜明的中国特色，其提倡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具有多重意义：既表达了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向往，对西方发展观的回应，又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人化自然观的继承，以及在新时代语境中对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理念的中国传统自然观的回归。”^[8]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统一而非矛盾对立,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不谋而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有高度契合性,二者皆反对主客二分,而强调其统一性。人需要认识并把握自然的规律性,顺应自然。在最理想的社会形态中,人与自然的矛盾得到彻底地解决。因而在人与自然关系层面上,进一步使得“第二个结合”成为可能。

(二) 从认识论层面探析“结合”何以可能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核心要义是:实践决定意识,是认识的基础;认识源于实践、检验于实践、发展于实践。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何为实践?实践是人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性物质活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中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ä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9]¹³⁷⁻¹³⁸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科学认识论。实践观阐述了实践与认识的关系问题,同时也阐述了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实践”是人本质存在方式的体现。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对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自古便有“重行”的传统。如《尚书·说命中》云:“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孔子强调:“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荀子·修身》中指出:“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墨家主张“行本论”:“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墨子·修身》)至明代王阳明则进一步提出“知行合一”的思想:“知行工夫,本不可离。”“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传习录》)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表率。其哲学著作《实践论》副标题就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指出:“毛泽东的‘知行统一’立刻会使人想起王的‘知行合一’;两者都是指认识和行动的统一。”^[10]²³⁷

毛泽东的实践观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的继承,更是“第二个结合”的真实写照。他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理论成功地融合在其实践哲学中,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 从方法论层面探析“结合”何以可能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方法论,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方法,强调人们要正确地认识和掌握世界运行的基本规律,才能更好地改造世界。马克思首先继承并肯定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11]⁹⁸这便是否定之否定的过程,马克思虽然肯定了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思想,但很快便对其展开批判。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只是其绝对精神的自我演化史,最大的问题是脱离了世界的物质第一性的基本前提。而历史的主体与创造者应当是物质的人,即现实中的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的人。只有唯物辩证法才能客观公正地帮助我们理解、把握进而改造世界。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便有的辩证法思想作为最重要的文化瑰宝延续至今。《周易》将宇宙本原“道”看作是阴阳二气的融合。

“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上》)道家的辩证法思想认为世间万物皆为矛盾对立的存在。“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道德经·二章》)“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道德经·二章》)矛盾双方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关系,并且矛盾双方会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道德经·五十八章》)“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道德经·四十章》)荀子对于宇宙运动变化的解读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荀子·礼论》)诸如以上辩证法思想贯穿了整个中国哲学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对于宇宙本原、社会运行规律的理解皆是基于辩证法的基础之上。虽然尚未形成完整严密的逻辑体系,但其在工夫论层面注重实践的智慧,早已深深融入中国人的

脑海中，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这种既注重实践又注重辩证法的朴素的思维模式，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层面高度契合，进一步为“第二个结合”提供了深厚的哲学根基。

四、“第二个结合”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实践路径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需求的深层对接

在经济全球化、文明多样化的当今时代，随着物质资源的不断丰富，人们的价值观体系呈多元化态势迅速发展。与此同时，现代性的诸多问题也随之产生，其具体表现为：工具理性日益膨胀，而价值理性日益萎缩；个人从原本的集体中的个体，逐步走向孤立、原子化状态；受货币拜物教的影响，享乐主义、娱乐至死的思想蔓延开来；信仰缺失与虚无主义价值观荼毒青年群体，使得人们沉溺于网络世界。

面对以上现代性与价值观多元化等问题的诸多挑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须挺膺担当，向难而行。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一步将自身之“经世致用”的精髓充分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首先满足当代人的现实需求，帮助人们解决实际问题，才能实现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真正振兴。而“经世致用”的思想始终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一以贯之的核心精神与价值取向。中华文明讲求任何学问与思想，必须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加以实践，才是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如《大学》有云：“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开篇就指出了学习的终极目的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北宋二程也指出：“穷经将以致用也。”（《二程遗书》）明末清初顾炎武认为学习的目的就是明理救世：“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亭林文集·与友人论学书》）“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正始》）中国自古便强调读书学习的目标是“以天下为己任”，改造社会，造福百姓，而绝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这便是中国自古的“家国情怀”。范仲淹

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流传千古。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家国天下”的深刻情怀，逐步成为数千年历史中人们心中不可磨灭的理想信念。而面对现代化过程中体现出的诸多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与“家国天下”的思想精髓将重新在这个新时代焕发生机，展现出生命力。这些思想精髓对于助力重塑中国人的信仰，解决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与虚无主义的错误影响等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与实践方案。

（二）传统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大众化转型与创新

中国哲学经历了从先秦诸子，至魏晋玄学，再到宋明理学及现代新儒家的不断发展。中国哲学亦随着历史长河的变迁而不断调整自身，通过传承与创新来不断适应时代的需求。然而，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时空差距导致了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语言的束缚，体现为现代人很难去阅读并理解古代晦涩难懂的语言。语言是文化传播过程中最重要的媒介，一旦此媒介出现了问题，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成为空谈。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化进程中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原文经翻译后，因句式复杂、概念抽象，大众在阅读理解时往往倍感困难、望而却步。这就需要首先推进语言的转型与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与中国哲学语言相融通，实现理论表达的大众化。例如，可运用“格义”方法，采用群众喜闻乐见、普遍使用的语言形式，进行深入浅出的翻译与阐释。毛泽东对此问题有着深刻洞察：“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12][84]}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率先实现了理论语言的大众化转型，为后世树立了典范。在“第二个结合”进程中，既要注重文化内容的契合与创新，也要重视作为文化传播载体的语言的现代转化与创新。

（三）文化表现形式与传播路径的多元化创新

“第二个结合”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造性转化，是指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化内涵和陈旧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3]203}这一转化路径要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并且改变其落后陈旧的表现形式,在当今时代重新焕发其生命力。发达的科技与智能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阻力而是全新的机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13]这便需要我们运用科技通过创新的多元化的方式将文化呈现在大众面前。

在当今时代,人们获取知识的途径大多源自网络平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表现形式和传播方式不能刻板守旧,而应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呈现形式。随着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文化传播方式与受众接受方式也日趋多样化。这既对“第二个结合”在新时代的实现提出了新要求、新挑战,也蕴含着新的发展机遇。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传播发展中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内容深度阐释不足、文化内在逻辑体系建构被忽视,以及网络空间存在内容歪曲与误读现象等。应当如何破解这些问题?首先,要运用前沿科学技术与多元化表现形式,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涵进行科学、深入的解析,并借助数智技术开展广泛传播与推广。其次,要推动文化学习融入日常生活,通过各类媒体平台加大对相关内容的多角度宣传,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思想理论以多元形式自然融入人们的生活场景,实现“日用而不觉”的传播效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范畴是“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亦讲求“经世致用”,崇尚“知行合一”而非“坐而论道”。唯有让人们切实感受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与实践价值,通过日常生活中的持续传播推广实现潜移默化的影响,才能最终推动“第二个结合”在表现形式与传播路径上实现多元化创新。

五、结语

在“第二个结合”视域下探索社会主义文化

繁荣发展的新路径,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与时代价值,能够为筑牢文化主体性、振兴民族精神、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提供根本性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2]47}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魂”,在新时代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方能切实回应时代之问,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化领域落地践行。

参考文献:

- [1] 不懈努力 接续奋斗 不断开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局面 [N]. 人民日报, 2025-10-24(003).
- [2]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 [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24.
- [3]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16.
- [4] 梁启超. 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 [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5.
- [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7]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8] 金瑶梅. “三重和解”何以可能——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意蕴的价值指向 [J]. 探索与争鸣, 2022(11): 38-40.
- [9]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10] WAKEMAN JR F. History and Will: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tung's Thought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 [11]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M]. 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18.
- [12]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13] 习近平.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N]. 人民日报, 2014-01-01(001).

(责编: 程爱婕)